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

叶秀山 著



A STUDY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Y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

叶 秀 山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徐书城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

叶 秀 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43,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500

书号 2002·249 定价 1.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早期古代希腊社会与早期希腊哲学	1
一、古代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形成与早期希腊哲学学派	1
二、雅典的黄金时代——伯利克里时期	19
三、雅典民主制的危机	31
第二部分 米利都学派的主要哲学范畴	41
一、关于泰利士的“始基”(ἀρχή)	41
二、关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ἄπειρον)	48
三、关于阿那克西曼尼的“气”(ἀήρ)	55
第三部分 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学说	60
一、“数”作为世界的始基	63
二、关于灵魂不灭和轮回说	76
三、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80
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社会观	82
第四部分 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论	86
一、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历史地位	91
二、“火”作为物质性的始基	97
三、逻各斯(λόγος)——变化的客观尺度	103
四、关于“二力背反”(παλίνωτος)	112
第五部分 论爱利亚学派	121

一、克萨诺芬尼与爱利亚学派	121
二、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131
三、芝诺的悖论	157
四、如何评价和理解梅里索斯问题	178
第六部分 恩培多克勒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地位	189
一、关于“四根说”	193
二、“爱”、“争”作为动力因	204
三、感觉与理智的关系	211
第七部分 阿那克萨哥拉的历史地位	219
一、阿那克萨哥拉与古代伊奥尼亚学派的关系	219
二、关于物质结构的学说	224
三、精神与物质的进一步分化——关于“νοῦς”(心灵)的学说	237
第八部分 关于原子论的一些问题	245
一、原子论的创始者——留基波	245
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260
三、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	283
四、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	293
第九部分 早期智者学派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终结	300
一、早期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	300
二、普罗塔哥拉斯——智者学派的奠基者	313
三、智者学派另一个奠基者——高尔吉亚	325
四、其他早期智者	339
附录: 帕拉梅德斯辩护词	357
主要参考书目	366
主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368
后记	374

第一部分

早期古代希腊社会与 早期希腊哲学

一、古代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 的形成与早期希腊哲学学派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哲学思想(前苏格拉底时期)涉及到欧洲哲学思想的最远古的起源,涉及到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中孕育着这些思想,涉及到这些思想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和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一样,深入地研究古代希腊哲学产生、发展的社会根源是饶有兴趣而又十分困难的。我们所能掌握的古代社会历史材料还不足以清楚地揭示它们与古代各哲学派别之间的直接的联系,古代社会历史材料和古代思想材料同样都比较零碎,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如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早期希腊哲学学派的发源地都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联盟中的某些城邦(如米利都、萨摩斯、科罗丰等),可是关于这些城邦的早期社会状况,我们只有极少的知识,这样,当我们研究早期这些地区哲学学派的社会基础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

些城邦的母邦——雅典的社会作为一个范例来研究，以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特点；至于更细致的研究，只能留待以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了。

我们都知道，哲学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因而，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哲学是对世界的本质的把握，它要在大量的经验的基础上，掌握最普遍、最本质的规律，因而需要思考；而在古代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哲学又需要有闲阶级的出现，即有一部分人脱离当时是十分艰苦的生产劳动，以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才有可能产生哲学学派，而这部分人则必定要靠大多数人的劳动来养活，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奴隶社会的产生，第一次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

“**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①

不仅如此，哲学是世界观，是思想体系，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它要在纷繁变化的现象中找出最普遍必然的规律，找出世界发展的第一性的决定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素，因而它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此它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一种社会条件，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并鼓励自由辩论，保护与传统的和流行的思想不同甚至对立的新思想表现和传播的权利。没有这一条，哲学不但不可能繁荣，甚至不能产生。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 哲学要从原始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需要社会的和政治的保护。米利都学派物质始基的科学精神要从奥尔弗斯神秘主义、荷马与赫西俄的神话宇宙观下挣脱出来，需要一个保护这种学说的制度，以免被传统吞噬。

当我们研究这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材料和思想材料、沉浸于构想当时社会状况的具体画面时，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哲学学派的发展是与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分不开的。我们所深切地感觉到的是：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在这个制度下，在某个特定时期固然也有哲学家被判放逐（如阿那克萨哥拉）甚至被判处死（如智者普罗底柯斯），但总的来说，各个学派在思想上都还是找到了相对的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

于是我们看到，古代希腊成为欧洲哲学的摇篮、人类文化的骄傲，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的。而雅典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6页。

其影响下的小亚细亚各城邦成为早期希腊哲学的中心，也不是偶然的。同样是奴隶制，在军事上、社会组织及爱国观念^①上强于（至少不弱于）雅典的斯巴达，却在思想文化上黯然失色，当然也是与具体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

于是，以雅典社会作为范例，对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发展作一些科学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个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和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其意义就不仅是交待本书所涉及的时代背景问题了。

1. 古代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 产生——梭伦改革

古代希腊(雅典)如何由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如何由荷马的英雄时代过渡到雅典奴隶主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利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材料线索，作了精辟的、科学的分析。

古代希腊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北方的亚该亚—爱奥利斯(Achaea — Aeolian)集团组成(包括帖撒利亚、比奥细亚、亚加狄亚、列斯堡及小亚细亚爱奥利斯区)；一部分是东方的伊奥尼亚(Ionian)集团组成(包括阿提刻、爱琴海大部分岛和小亚细亚中部地区)；一部分是南方的多利亚(Dorian)集团(包括科林斯、斯巴达、阿果斯、麦加拉)。而其中主要是

^① 波希战争中，斯巴达王李奥尼德战至一兵一卒的英雄气概，连同铭文上的豪言壮语（“过路的人啊，请你告诉斯巴达人，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葬身于此。”——ὦ ξεῖν, ἀγγέλλειν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υς ὅτι τῆδε κείμεθα τοῖς κείνων ῥήμασι πειθόμενοι——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第228节，姜柏本，第3册，第544页），至今令人缅怀。

东方的雅典、北方的梯比斯、南方的斯巴达和阿果斯四个城邦。这些城邦的出现，氏族贵族已经逐渐转化为奴隶主，军事民主时期的王（βασιλεύς）和民众会、长老会已经逐渐变成奴隶主国家机器。

希腊各城邦在形成自己的城邦奴隶国家时，都经历着各自的道路，有着各自的特点。我们看到，在这方面，雅典与斯巴达一开始就有着历史性的区别。斯巴达城邦是由于多利亚人入侵拉哥尼亚（Laconia）平原而形成，入侵者把原居民——希洛人（Helots）制伏为奴隶，而雅典城邦的奴隶的来源则是靠战争或海盗抢劫来的外国人。在雅典的土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远古传说提秀斯（Theseus）时期的伊奥尼亚人。雅典的海上优势，便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外来的奴隶；而斯巴达则处于一种封闭的状况下，在榨取、奴役希洛人的同时，内部亦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许能够说明在雅典便于实行奴隶主民主制的历史原因。

所谓“民主”，本来是原始氏族公社内部的一种令人神往的普遍的传统，但是在那种生产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所以那种“民主”又远非理想的。恩格斯曾经指出：

“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即原始的王——引者）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1页。

我们在研究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和发展时，处处都感觉到雅典人要力图维护、发展这种公民内部的“自然的民主制”，而要做到这一点，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外部的奴隶的劳动则是绝对不可少的。

如果提秀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那末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确立的关键则在于梭伦(Solon)改革，而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哲学创始人泰利士(Thales)正是梭伦的同时代人，二人同时都被归于古代希腊的“七贤”之列。

梭伦改革的内容很多，其主要精神在于确立奴隶主私有制和调整公民内部的关系，不使两极过于分化，而在奴隶主私有制的许可下维护本部族表面的公民内部的“民主”。

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集中和贫富的分化，不仅是氏族公民与奴隶之间的问题，由于在起初奴隶本是一无所有，所以所谓分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公民内部。这种分化在当时固然是不可避免的，是私有制确立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要作一定的调整。梭伦的改革也就是要适应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①梭伦于公元前594年执政后，推行各种改革，以进一步摧毁氏族公社的经济制度。他的主要措施是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112页。

在立法上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并承认私有财产的继承自由。我们知道,在氏族公社内部,财产完全归氏族公有,个人的用具(包括劳动工具)在本人死后不是随着殉葬,就是由公社重新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财富增多,出现了长子继承权,但在无子续的情况下,仍然归公。到了梭伦的时代,彻底取消了个人财产死后归氏族所有的传统,而以死者生前遗嘱决定个人财产的归宿。正如摩尔根说的:“当梭伦许可财产的所有者,如果在没有子女时,得依照他的遗嘱处分其财产时,这可以说,梭伦对于氏族的财产权给予了第一次的侵犯。”^①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斯巴达,为了使财产不流入外族,对未婚女继承人的财产,只有王才有权指定继承人^②。对比之下,雅典梭伦的制度更加进一步保证了私有财产的权利,从而更多地破坏了氏族的权利。

与此同时,梭伦还把公民以财产收入划分四个等级,赋予各等级不同的权利。第一等为收入在 500 麦斗(每麦斗合 52.3 公升)者,第二等为 300 麦斗者,第三等为 200 麦斗者,第四等为 200 麦斗以下的“雇工”。第一、二等可以担任高级官吏,第三等可作低级官吏,第四等则无权作官。从此以后,贵族门第只有传统意义的“光荣”,而这种“光荣”只有在与财产收入结合起来时才具有政治意义;贵族后裔的政治特权被取消,而代之以财产多寡决定等级。

财产的继承自由,保证了贵族大户不至因家长死亡而家道衰落,财产的等级制又保障了在行商航海中发财的新兴富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60 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姜柏本,第三册,第 204 页。

户的政治权利,这在当时对贵族的特权是一种有力的抑制,而对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则是一种鼓励。

抑制贵族特权的另一个办法是取消债务,限制土地过于集中。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见梭伦当年宣布废除债务令(所谓“解负令” Seisacktheia, σεισάχθεια)时引起的欢呼雀跃,因为放高利贷是贵族剥削一般公民、使某些公民沦为奴隶的主要办法。

研究一下这种用行政命令取消债务的办法竟然得以实行是很有意义的。这一办法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解脱相当的债户,扩大公民人数,取得多数公民的拥护。同时,它也还带有维护本族公民“自然民主制”的传统的力量,因而具备了实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与取消债务相应的还有两条措施,一条是由城邦出钱赎回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隶的雅典人,一条是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债务抵押。这些措施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护原有公民的自由权利,不使本族人沦为奴隶。不仅如此,梭伦的改革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人数,其办法是奖励外邦的有技术的工匠定居雅典,不仅给予保护,而且给予公民权。这一切,当然是适应当时发展生产所需要的。

恩格斯在谈到梭伦取消债务令时把它与法国大革命时的措施相比,他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①其意义是:“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1页。

雅典以外的买主了”^①，而奴隶的来源是外部的，因而剥削奴隶和外邦是一致的，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其目的是“必须防止”“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②。

限制公民(自由民)内部的分化，保持、维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公民内部的“自然民主制”，这就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具体历史特点，也是它与包括斯巴达在内的一切贵族寡头制的区别所在。

2. 希腊(雅典)民主制的建成和发展、 巩固——克利斯提尼革命

梭伦改革体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基本精神，但它还需要在政治体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当然，梭伦在体制方面也有相应措施，如设立四百人的公民议事会，以四个部落作为选区，一、二、三等公民都可参加，设立全体公民都可参加的陪审法庭等，但有待于完善。标志着雅典民主制最终建成的是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的革命。

在雅典，从梭伦到克利斯提尼中间还有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僭主政治。这可以看作雅典民主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一段插曲。早期的所谓僭主，实际上大都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尤其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他对雅典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的。他给山区贫民发放贷款，鼓励农民耕作，颁行全国所得税，用经济办法增加国家收入，但却蠲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2页。

② 同上，第111、112页。

免了一些最贫苦农民的赋税；他加强海军，发展黑海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文化教育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据说荷马史诗就是经他主持审定后成为当时的课本。他之所以被称为僭主，因为他不是通过公民大会的推举，而是用暴力夺取了权利。传说他把公民召集到市场上，扣留了各部族公民的武器，叫大家各守本分，国家的事信托给他^①。用这种手段夺得的政权，使他建立了私人的卫队，为以后僭主专权开了先例。果然，他的儿子希庇阿斯日益骄横，终于被克利斯提尼赶走。

我们看到，最初只有在与民主制对比下才有僭主政制，这种政制在政治上是与民主政制的精神相对立的，而僭主具有“暴君”的意义，则是后来的事。

克利斯提尼执政时期，标志着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最终建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 509 年）才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②而这个时期，也正是萨诺芬尼（Xenophanes，公元前 538 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 531 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 503 年）的全盛时期。

克利斯提尼革命的重点，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进一步摧毁氏族公社的残余，确立奴隶主民主制的传统。普罗塔克（Protagoras）说，他“赶走了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结束了僭主的篡权，制定法律，建立一种政府的典范，使人民和谐而安

① 参阅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9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3 页。

全。”^①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取消四个部落选区，把全国分为一百个村社(δῆμος)^②，十个选区，以地籍代替了族籍。

克利斯提尼这一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最后摧毁了原始部落的存在，打破了原有部落的界限，一方面促进了全体公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传统的门阀力量^③。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总结的，克利斯提尼“既成为大众领袖，第一步便把所有的居民划为十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来；有一句本是对那些想查问人民氏族的人说的成语，‘部落无分彼此’，便是由此而来的。”^④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人数的增加，克利斯提尼把议事会由400人扩大到500人，而当时雅典有公民权的人数大概是三万——三万五千人，这样的比例，当然是能代表公民普遍意志的了。

雅典的“执政官九人团”本来是由原始的“王”衍变而来的比较分散的权力机构，分首席执政官（因以其名为年号，故一日名年执政官），祭仪执政官（王），军事执政官以及六个司法官。为了进一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以扩大民主，限制、杜绝僭主政制，克利斯提尼还另设十将军（司令官）制，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任期一年，轮流统率军队。执政官不得连任，军事长

① 普罗塔克：《伯里克利传》，《名人传》，人人丛书，第1卷，第228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娄柏本，第一册，第72页。

③ 参阅爱柏特（E. Abbott）：《伯利克里和雅典的黄金时代》，纽约，1903年，第13页。

④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第25页。

官则可以连任，^① 这样，本来已经分散的权力，就更进一步掌握在较多的人手里了。

雅典的一切官员，或抽签任用，或举手表决，或鼓噪通过，都不得以暴力独揽大权。以暴力专权者，是为僭主，是与雅典的民主精神不符合的，亦即与雅典极力想在奴隶制许可下保存的一点点“自然民主制”传统精神不符合的。为了防止僭主篡权，克利斯提尼建立了“贝壳放逐法”^②，每年春季召开公民大会，决定有无该放逐之人，如有，在牡蛎壳或陶片上写下名字，超过 6000 票，则放逐十年后才能回来。这样，雅典就在一个小范围内，维护了公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恩格斯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历史时指出：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于了。”^③

3. 维护奴隶主民主制的第一战——波希战争

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接受了各个方面的挑战，不仅有内部的贵族派的斗争，而且受到外部侵略的威胁。就在毕达哥拉斯死时（公元前 497 年）已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第 65 页。

^② 一说其他的城邦亦有此法，非克利斯提尼发明，但克利斯提尼引入雅典，开始实行，恐无疑问。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5 页。